

1957

我们既是唯物主义者又是唯心主义者；在公开的场合是唯物主义者，在书斋里是唯心主义者；在政治上是唯物主义者，在学术思想上是唯心主义者。这是我们的矛盾。

——邵昕

在这里我只根据一个普通人的常识，指出一个客观事实，就是有些人的思想就象蛤蟆一样，是水陆两栖的，时而唯心，时而唯物。

——朱光潜

我对好的唯心主义是有感情的，这是对优秀文化遗产有感情。我同意胡绳同志的话：糟蹋唯心主义也就是糟蹋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哲学是不应任意糟蹋的，须用认真批判态度去对待，正如佛教经典和庙宇都不能随便破坏那样。

——贺麟

哲学史中的某些哲学命题，我们若专注重于其抽象意义，它是不是对一切阶级都有用呢？要是这样，哲学史中的某些哲学思想，是不是就不是上层建筑呢？

——冯友兰

赵修义 张翼星 等编

守道 1957

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
实录与反思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B2
20137

P1

赵修义 张翼星 等编

守道 1957

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
实录与反思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守道 1957: 1957 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实录与反思 /
赵修义等编.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ISBN 978-7-208-10947-6

I. ①守… II. ①赵… III. ①哲学史—研究—中国
IV. ① 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07846 号

责任编辑 马晓玲
封面设计 蔡立国
版式设计 黄安乔



守道 1957——1957 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实录与反思
赵修义 等编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13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 8 号林达大厦 A 座 4A)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 1020 毫米 1/16
印 张 43.25
插 页 2
字 数 616,000
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 S B N 978-7-208-10947-6/B.951
定 价 89.00 元

北京大学哲学系召开一百多人的座谈会 热烈讨论中国哲学史的若干问题

【本报北京二十日电】北京大学哲学系召开的关于中国哲学史几个问题的座谈会，已于二十日晚，在系大教室结束。这次座谈会由系党委书记、哲学系副主任、哲学系教授、历史系教授等一百多人参加。会上，对几个问题的讨论，都有自由辩论的气氛，充分体现了学术上“百家争鸣”的方针。

哲学史上的唯物史观与唯心主义的斗争

会上，首先由哲学系教授、系副主任、哲学系教授、历史系教授等一百多人发言。会上，对几个问题的讨论，都有自由辩论的气氛，充分体现了学术上“百家争鸣”的方针。

会上，首先由哲学系教授、系副主任、哲学系教授、历史系教授等一百多人发言。会上，对几个问题的讨论，都有自由辩论的气氛，充分体现了学术上“百家争鸣”的方针。

会上，首先由哲学系教授、系副主任、哲学系教授、历史系教授等一百多人发言。会上，对几个问题的讨论，都有自由辩论的气氛，充分体现了学术上“百家争鸣”的方针。

会上，首先由哲学系教授、系副主任、哲学系教授、历史系教授等一百多人发言。会上，对几个问题的讨论，都有自由辩论的气氛，充分体现了学术上“百家争鸣”的方针。

唯物史观并不是绝对的，不是可有可无的。唯物史观是历史观，并不等于它是历史观。唯物史观是历史观，并不等于它是历史观。唯物史观是历史观，并不等于它是历史观。

唯物史观并不是绝对的，不是可有可无的。唯物史观是历史观，并不等于它是历史观。唯物史观是历史观，并不等于它是历史观。

唯物史观并不是绝对的，不是可有可无的。唯物史观是历史观，并不等于它是历史观。唯物史观是历史观，并不等于它是历史观。

唯物史观并不是绝对的，不是可有可无的。唯物史观是历史观，并不等于它是历史观。唯物史观是历史观，并不等于它是历史观。

在研究中国哲学史时，唯物史观是主要的，但唯物史观不是唯一的。唯物史观是主要的，但唯物史观不是唯一的。唯物史观是主要的，但唯物史观不是唯一的。

在研究中国哲学史时，唯物史观是主要的，但唯物史观不是唯一的。唯物史观是主要的，但唯物史观不是唯一的。唯物史观是主要的，但唯物史观不是唯一的。

在研究中国哲学史时，唯物史观是主要的，但唯物史观不是唯一的。唯物史观是主要的，但唯物史观不是唯一的。唯物史观是主要的，但唯物史观不是唯一的。

在研究中国哲学史时，唯物史观是主要的，但唯物史观不是唯一的。唯物史观是主要的，但唯物史观不是唯一的。唯物史观是主要的，但唯物史观不是唯一的。

在研究中国哲学史时，唯物史观是主要的，但唯物史观不是唯一的。唯物史观是主要的，但唯物史观不是唯一的。唯物史观是主要的，但唯物史观不是唯一的。

在研究中国哲学史时，唯物史观是主要的，但唯物史观不是唯一的。唯物史观是主要的，但唯物史观不是唯一的。唯物史观是主要的，但唯物史观不是唯一的。

在研究中国哲学史时，唯物史观是主要的，但唯物史观不是唯一的。唯物史观是主要的，但唯物史观不是唯一的。唯物史观是主要的，但唯物史观不是唯一的。

北京哲学界讨论中国哲学史问题

【本报北京二十日电】北京大学哲学系召开的关于中国哲学史几个问题的座谈会，已于二十日晚，在系大教室结束。这次座谈会由系党委书记、哲学系副主任、哲学系教授、历史系教授等一百多人参加。会上，对几个问题的讨论，都有自由辩论的气氛，充分体现了学术上“百家争鸣”的方针。

会上，首先由哲学系教授、系副主任、哲学系教授、历史系教授等一百多人发言。会上，对几个问题的讨论，都有自由辩论的气氛，充分体现了学术上“百家争鸣”的方针。

会上，首先由哲学系教授、系副主任、哲学系教授、历史系教授等一百多人发言。会上，对几个问题的讨论，都有自由辩论的气氛，充分体现了学术上“百家争鸣”的方针。

会上，首先由哲学系教授、系副主任、哲学系教授、历史系教授等一百多人发言。会上，对几个问题的讨论，都有自由辩论的气氛，充分体现了学术上“百家争鸣”的方针。

会上，首先由哲学系教授、系副主任、哲学系教授、历史系教授等一百多人发言。会上，对几个问题的讨论，都有自由辩论的气氛，充分体现了学术上“百家争鸣”的方针。

会上，首先由哲学系教授、系副主任、哲学系教授、历史系教授等一百多人发言。会上，对几个问题的讨论，都有自由辩论的气氛，充分体现了学术上“百家争鸣”的方针。

唯物史观是主要的，但唯物史观不是唯一的。唯物史观是主要的，但唯物史观不是唯一的。唯物史观是主要的，但唯物史观不是唯一的。

唯物史观是主要的，但唯物史观不是唯一的。唯物史观是主要的，但唯物史观不是唯一的。唯物史观是主要的，但唯物史观不是唯一的。

唯物史观是主要的，但唯物史观不是唯一的。唯物史观是主要的，但唯物史观不是唯一的。唯物史观是主要的，但唯物史观不是唯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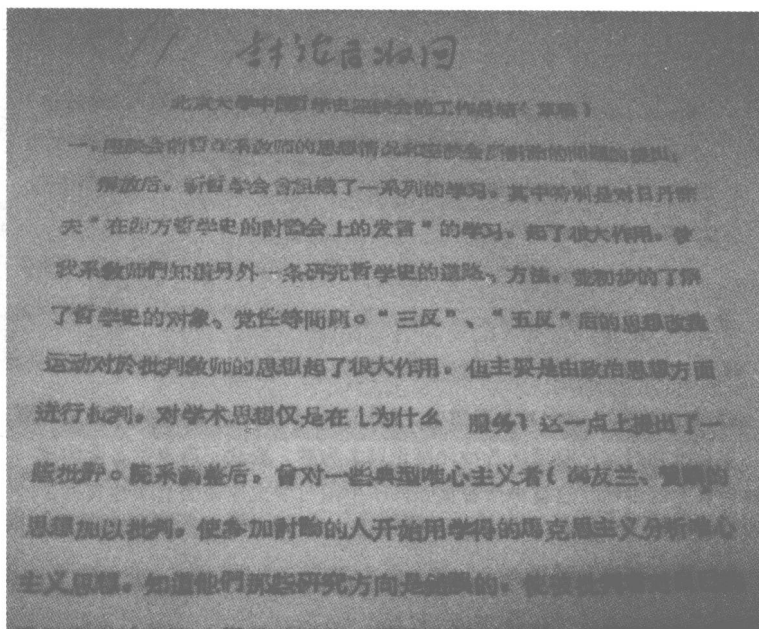
唯物史观是主要的，但唯物史观不是唯一的。唯物史观是主要的，但唯物史观不是唯一的。唯物史观是主要的，但唯物史观不是唯一的。

唯物史观是主要的，但唯物史观不是唯一的。唯物史观是主要的，但唯物史观不是唯一的。唯物史观是主要的，但唯物史观不是唯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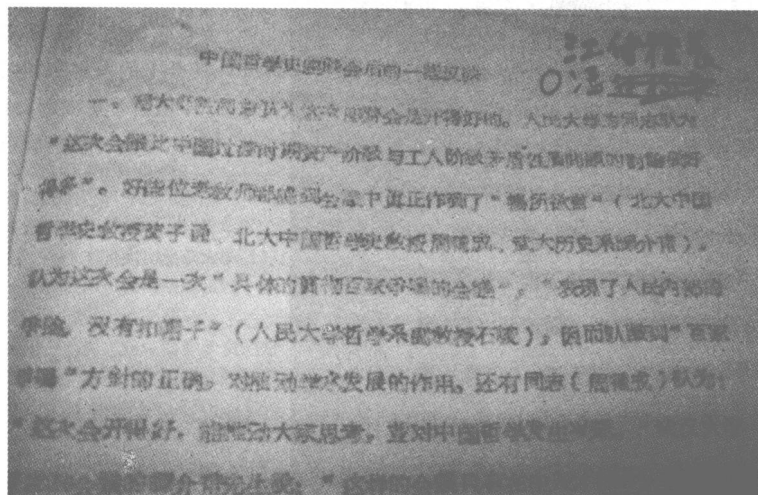
唯物史观是主要的，但唯物史观不是唯一的。唯物史观是主要的，但唯物史观不是唯一的。唯物史观是主要的，但唯物史观不是唯一的。

唯物史观是主要的，但唯物史观不是唯一的。唯物史观是主要的，但唯物史观不是唯一的。唯物史观是主要的，但唯物史观不是唯一的。

1957年1月22—26日，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召开，《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等纷纷详细报道了会议的相关情况。



北京大學哲學系對中國哲學史座談會做了總結。圖為《北京大學中國哲學史座談會的工作總結（草稿）》，現藏於北京大學檔案館。



北京大學中國哲學史黨支部也對這次會議進行了反思。圖為《中國哲學史座談會後的一些反映》（圖中的“江仲樞”指時任北大黨委書記的江隆基同志，“馮”指馮定同志，原任華東局宣傳部副部長，此時已調到北大工作），現藏於北京大學檔案館。

坚决拥护 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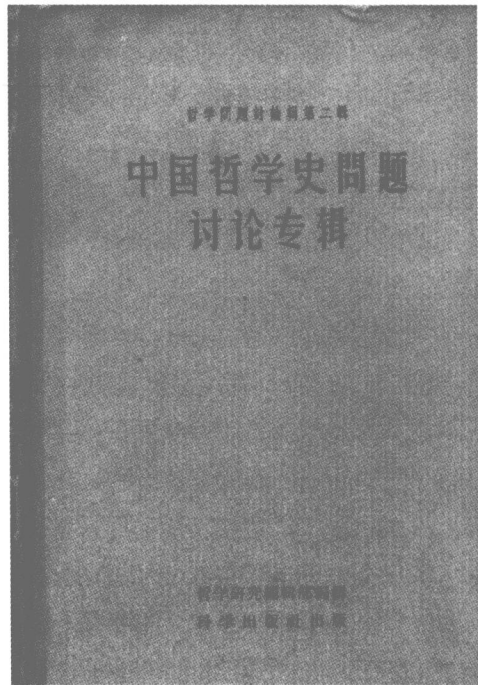
冯友兰批判对这一政策的各种怀疑论调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提出的。这个方针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重大决策。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一贯的民主精神和实事求是的作风。这一方针的提出，得到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热烈拥护和积极响应。它不仅为知识分子提供了广阔的学术自由空间，也为我国科学文化的繁荣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在党的领导下，广大知识分子将充分发挥聪明才智，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提出的。这个方针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重大决策。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一贯的民主精神和实事求是的作风。这一方针的提出，得到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热烈拥护和积极响应。它不仅为知识分子提供了广阔的学术自由空间，也为我国科学文化的繁荣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在党的领导下，广大知识分子将充分发挥聪明才智，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1957年3月，《人民日报》以《坚决拥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 冯友兰批判对这一政策的各种怀疑论调》为题，登载了冯友兰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的讲话。这篇讲话着重强调了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真实地贯彻了双百方针。



《哲学研究》编辑部将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上的发言和相关文章收集编印为《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于1957年7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刊行1万余册，反响甚大。

哲学史家聚会北大临湖轩 座谈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

本报讯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教育部在北京大学临湖轩举行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由潘梓年主持。会上，哲学史家们就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部长冯友兰在会上作了题为《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问题》的报告。他指出，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问题，首先要明确哲学史的性质和任务。哲学史不仅是历史的记录，更是思想的总结。其次，要重视对原始文献的研究，这是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基础。第三，要注意对哲学史进行系统的整理和概括，使之成为一门科学。第四，要重视对哲学史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使之成为一门艺术。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汤用彤、任继愈、冯友兰、李达、侯外庐、任继愈、冯友兰、李达、侯外庐等在会上作了发言。他们就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会上，大家一致认为，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能教条主义，也不能主观主义。要重视对原始文献的研究，这是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基础。其次，要注意对哲学史进行系统的整理和概括，使之成为一门科学。第三，要重视对哲学史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使之成为一门艺术。

1957年5月14日 星期二 中国哲学史工作会议第三次 在遗产继承等问题上尖锐交锋

本报讯 在北京大学举行的中国哲学史工作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于5月14日在临湖轩举行。会上，大家就遗产继承等问题进行了尖锐的交锋。

会上，大家就遗产继承等问题进行了尖锐的交锋。会上，大家一致认为，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能教条主义，也不能主观主义。要重视对原始文献的研究，这是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基础。其次，要注意对哲学史进行系统的整理和概括，使之成为一门科学。第三，要重视对哲学史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使之成为一门艺术。

会上，大家就遗产继承等问题进行了尖锐的交锋。会上，大家一致认为，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能教条主义，也不能主观主义。要重视对原始文献的研究，这是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基础。其次，要注意对哲学史进行系统的整理和概括，使之成为一门科学。第三，要重视对哲学史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使之成为一门艺术。



中国哲学史工作会议散记

郝逸今

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史研究联合召开的中国哲学史工作会议，于5月10日至14日在北京大学临湖轩举行。会场气氛非常活跃，首由潘梓年宣布召开这次哲学工作会议的目的，并提出下列三个问题，做为会议讨论的中心内容：

- 1、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 2、中国哲学史目前进行研究的问题；
- 3、中国哲学史资料问题。

继由冯友兰介绍了今年1月间在北京大学召开的哲学史讨论会的一些收获，以及尚未解决的一些问题。

上次讨论会反映出一些同志对中国哲学史的对象问题存在着分歧的看法；有些同志对于日丹诺夫给哲学史所下的定义的正确性表示怀疑；也有一

的。但是我们要找出它的规律，必须要一方面注意研究自然科学的发展，一方面要把中国哲学史当成世界哲学的一部分。因此研究中国哲学史，就应该而且必须注意西方哲学史、东方哲学史的研究工作。

于光远在发言中说：方法论的问题很重要，它好比船上的舵，如果不先把舵掌握好，就投入大量劳动力，结果便会走弯路，以致耗损许多气力。

馮契指出：哲学思想的一般规律，不但要从社会经济关系中去找，还要从哲学自身的发展和和其它社会意识形态的联系中去找。

楊荣国认为：对历史上的哲学家，我们必须用阶级观点进行分析，不能单看他讲了些什么话，因为这样看是很难正确和全面的了解。譬如孟子讲君轻民贵，我们应好好研究和分析一下，孟子所讲的民

1957年5月10—14日，为推广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成果，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哲学系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联合召开了哲学史工作会议，就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问题继续进行深入探讨。《人民日报》、《新建设》等刊载了相关报道。

November 21, 1956

To

Mr. Tsiang

Chair of Propaganda Department
Beiping, China.

Sir,

I dispatch (Reuters) from Beiping, dated Nov. 17, reports you as saying that

"Only through open debate can materialist thinking overcome idealist thinking".

Well, Mr. Tsiang

China is a vast land of good sense. And I wish you, as myself an old friend of China, which I have visited, and a writer on philosophy, to congratulate you on bringing this principle into effect, as a matter which concerns the common interests of mutual understanding among the peoples of the world.

Political action must proceed upon a philosophical standpoint. This is what we mean by "ideology". But an ideology must be shown to be in agreement with public convictions, otherwise the state needs no hollow foundations. And public convictions cannot be created nor sustained by administrative orders alone. The life of thought, expressed in debate, must continue.

Perhaps, Sir, you will allow me one question and one suggestion.

The question has to do with the "idealism" which you place in contrast with materialism.

The slogan I refer to concerned the statement that the philosophies of Hegel and Kant and Russell are to be taught at Peking University, as representing idealism. No better words of idealism could be chosen than Hegel's. For even Hegel's idealism could be shown to be materialist. However, idealism is a development as in an organism, and it is not to be regarded as a simple, unchanging, and unchanging entity.

Philosophy in this sense is not to be understood as a simple, unchanging, and unchanging entity, but as a living, growing, and changing organism. It is not to be understood as a simple, unchanging, and unchanging entity, but as a living, growing, and changing organism.

THE HOUGHTON LIBRARY
Richard Hocking
BMS Am 2375 (5985)
Ting-Yi Lu. Correspondence with William Ernest Hocking, 1956. 1 folder
92M-71

哲學大綱

此書係根據作者多年教學經驗編成，內容豐富，論述精闢，為哲學界人士必讀之書。全書共分四編，第一編為緒論，第二編為形而上學，第三編為認識論，第四編為倫理學。全書文字簡潔，論理清晰，為初學者之良伴，亦為研究者之參考。

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

Feb. 22nd, 1957.

To Professor William Ernest Hocking

Dear Sir:

Permit us to thank you on behalf of Mr. Lu Ding-Yi. Yours of 21st, Nov. 1956 is a letter that helps towards furthering the friend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peoples, especially those between our respective philosophers. Mr. Lu Ding-Yi and we ourselves are convinced that close contact between philosophers through mutual correspondence will have desirable effects in advancing the cultural flow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in furthering the interest of universal peace.

In your letter, you hope to know how we define idealism in contrast with materialism. We are glad to say that in the representative works on Marxist philosophy, the problem is clearly and distinctly solved. The Chinese Marxists have no special view of their own.

True, we have already had or are going to have in Peking University and elsewhere courses introducing idealism. These are meant for the advanced student in the philosophy department. We regard these courses necessary for the student, if they were to enlarge their field of learning and to cultivate their ability in combating against wrong world-outlooks.

You refer to *Types of Philosophy*. Yes, it was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in 1931. Some of us are going to study it closely as well as the new version to be issued by Scribner's after we get hold of it.

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

Feb. 22nd, 1957.

We have always held the view that in universal peace and order, philosophers have a duty and should responsibly. We are happy to hear that you as well as the many in the East you have manifested your valuable efforts in this great field. We are sure that the Chinese philosophers are perfectly willing to establish contact with you and American philosophers through correspondence or other ways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cultural exchange and to advance the understanding and friendship between the American and Chinese peoples.

Very sincerely you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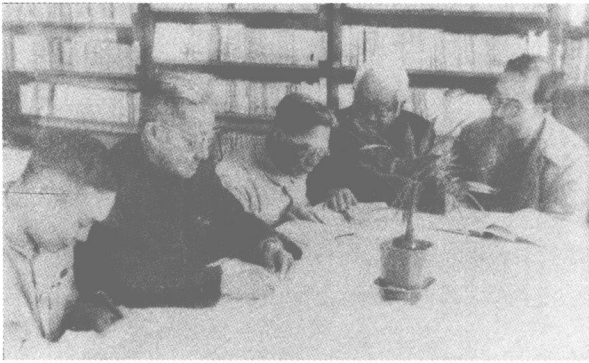
Lu Ding-yi
Director of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Lu Ding-yi
Director of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中国哲学界关于唯心主义的讨论引起了海外学者的关注，哈佛大学哲学系教授霍金（William Ernest Hocking, 1873—1966）专门就“如何看待唯心主义”与陆定一、潘梓年、金岳霖通信讨论。来往信件现藏于哈佛大学档案馆。



1954年，北大哲学系教师与苏联专家在未名湖畔合影。二排右起：邓以蛰、郑昕、萨波什尼可夫、冯友兰、马采、洪谦、宗白华；一排右起：王宪钧、汪子嵩。



1950年代，北大哲学系诸位先生在研讨。右起：冯友兰、汤用彤、朱谦之、黄子通。



1960年代初，冯友兰（中间蓄须者）与哲学系同事进行有关中国哲学史的讨论。左一为郑昕，右一为任继愈。

目 录

001 前 言

1957年中国哲学史会议实录

- 011 北京哲学界讨论中国哲学史问题
- 015 北京大学哲学系召开中国哲学史座谈会
- 022 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工作总结（草稿）
- 029 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后的一些反映
- 033 坚决拥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 冯友兰批判对这一政策的各种怀疑论调
- 037 哲学史家聚会北大临湖轩 座谈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
- 039 中国哲学史工作会议第三天 在遗产继承等问题上尖锐交锋
- 041 中国哲学史工作会议闭幕 昨日讨论资料整理出版问题
- 042 中国哲学史工作会议散记

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

- | | | |
|-----|-----|--|
| 郑 昕 | 055 | 开放唯心主义 |
| 冯友兰 | 062 | 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两个问题 |
| 冯友兰 | 072 | 关于《两个问题》的补充意见 |
| 朱伯崑 | 076 | 我们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 |
| 洪 谦 | 082 | 谈谈学习西方哲学史的问题 |
| 任继愈 | 089 | 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 |
| 汪 毅 | 096 | 一个问题，一点意见 |
| 石 峻 | 101 | 论有关“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的讨论及其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 |
| 张岱年 | 114 | 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范围问题 |
| 朱谦之 | 120 | 关于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问题 |
| 朱启贤 | 124 | 关于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问题 |
| 韩树英 | 133 | 谈谈关于哲学史的对象问题 |
| 杨宪邦 | 140 | 关于中国哲学史的科学性和党性
——对于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问题的意见 |
| 张岱年 | 153 | 关于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的几个问题 |
| 任继愈 | 158 | 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所遇到的几个困难问题 |
| 张恒寿 | 164 | 关于中国哲学史中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 |
| 朱光潜 | 172 | 谈思想两栖 |
| 魏明经 | 175 | 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史 |
| 王太庆 | 185 | 哲学史研究的方法与目的问题 |
| 贺 麟 | 194 | 对于哲学史研究中两个争论问题的意见 |
| 贺 麟 | 202 | 关于对哲学史上唯心主义的评价问题 |
| 陈修斋 | 207 | 对唯心主义哲学的估价问题 |
| 关 锋 | 209 | 关于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问题 |
| 张世英 | 217 | 略谈对唯心主义的评价问题 |
| 陈修斋 | 224 | 关于对唯心主义的估价问题的一些意见 |

张岱年	233	如何对待唯心主义
王方名	239	关于对待唯心主义问题
任 华	251	谈谈哲学史研究中的教条主义倾向
邓初民	254	读了关锋先生《关于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问题》以后
冯友兰	260	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
冯友兰	266	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继承问题的补充意见
周辅成	270	必须重视祖国哲学遗产的特点和价值
张岱年	277	道德的阶级性和继承性
朱启贤	279	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
杨正典	298	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的几点意见
黄子通	306	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继承问题的错误观点
张岱年	312	关于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
定 思	315	中国哲学史中的继承性问题
吴恩裕	319	我对几个哲学问题的看法
汤一介	325	谈谈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
关 锋	333	关于继承哲学遗产的一个问题
燕鸣轩	344	对《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的一点意见
赵俪生	350	论哲学遗产的具体意义与抽象意义的区分 ——对冯友兰先生一些看法的商榷
张恩慈 沈少周	355	怎样认识哲学中的阶级性和继承性的关系
杨洁民	360	谈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并与冯友兰先生商榷
萧萐父	367	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性
萧萐父	374	关于继承祖国哲学遗产的目的和方法问题
艾思奇	385	对《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的一些意见
李志逵	389	读冯友兰先生《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两个问题》 的一点意见
孙长江	397	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社会历史理论中有没有唯物主义 和唯心主义的斗争
羊华荣	405	我赞成冯友兰先生的看法

戴清亮	林可济	413	对马克思主义以前历史观的评价的一些意见
	唐 钺	426	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所引起的三个问题
	温公颐	432	对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些意见
	胡 绳	437	关于哲学史的研究
			补遗
	贺 麟	454	必须集中反对教条主义
	关 锋	458	反对哲学史工作中的修正主义

回顾与反思

	汪子嵩	497	一次争鸣的讨论会
	方 昕	506	短暂机遇期的一次全国性学术盛会 ——1957年北大中国哲学史座谈实况追记与反思
	梁志学	515	我的回忆
	周继旨	518	有关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回忆与反思
	张翼星	532	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召开的缘由和启示
	赵修义	545	不该湮没的一次“百家争鸣”的尝试
	陈村富	577	中国哲学史座谈会55年祭
	谢 龙	591	百家争鸣与反对教条主义——“启蒙”征兆被催毁的历史教训
	张翼星	598	一场有待展开的哲学争鸣 ——我对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几点认识
梁志学	陈 霞	611	论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对“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反思
	陈 霞	619	谈谈哲学与政治的关系 ——对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再反思
	陈卫平	629	“抽象继承法”蕴涵的问题：传统哲学何以具有当代价值
	郁振华	639	1957年中哲史座谈会上的冯友兰和贺麟
	晋荣东	646	教条主义及其认识论根源——冯契与1957年中哲史会议
	顾红亮	659	“你们如何界定唯心主义？” ——记霍金与陆定一、潘梓年、金岳霖的几则通信 附：霍金与陆定一、潘梓年、金岳霖的来往信件
		676	后 记

前 言

1957年1月北京大学哲学系发起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已经过去了55年。时间流逝，光阴不再。会上活跃的老一辈学者大都已经离世，当时年轻的参与者也都进入耄耋之年。环顾今天中国的哲学界，已经沧海桑田。当年争得面红耳赤的那些问题，似已少有关注。如今，为什么还要重新端出这一段往事，将当时的历史资料（包括当时的报道，档案中保存的有关原始资料，参与讨论的论文和会上的发言稿以及在海外发现的资料）重新编纂并加以回顾和反思呢？

因为，这次全国性学术会议在新中国成立早期30年中，实在是太难得、太重要了。然而现在几近被遗忘。我们觉得有一份责任，让这个如此重要的会议不致被岁月所湮没。

之所以说是难得，是因为，30年间，中国的学术（尤其是哲学）一直处于意识形态斗争的漩涡之中，批判连绵不断。高层定调，有组织有计划地展开，而且都是紧密地与政治运动联结在一起。学术（尤其是哲学的批判）有的时候是运动的前奏，有的时候就是运动的主题，有的时候是一个外壳，有的时候则是政治运动的深化和延伸。那些学养丰厚的学术大家，或是缄默，或是成为批判的对象，或是被迫作出各种各样的违心的自我批判。讲真话，就真问题进行自由的讨论，彼此诘问，互相切磋，几乎绝迹。唯有这次座谈会，如当时主持哲学系工作、这次会议的主要筹办者之一的汪子嵩先生所说是“建国后近30年中仅有的一次基本上做到自由争鸣的讨论会”。

这次会议可以说是群贤毕至。不仅会议的主角冯友兰、贺麟、金岳霖等一群原本建有自己的哲学体系的大家坦陈自己的见解，而且革命时代就开始学术生涯的顶级马克思主义学者胡绳、潘梓年、于光远、艾思奇等积极参与讨论。不仅如此，那个时代的各个不同学科的许多资深学问家如朱谦之、朱

光潜、金克木等都参与争辩，在此后举办的中国哲学史工作会议上，何思敬、侯外庐、吕振羽等著名学者也应邀与会并踊跃发言。可以说当代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上的名家大多都在这次大讨论中现身，坦陈自己的见解。还有更多学养深厚的中青年学者，甚至一些在读学生也参与讨论并发表文章提出自己的各种见解。这是 30 年间唯一一次名家荟萃，老中青学者参与，气氛活跃，畅所欲言又向全社会广泛传播的一次学术会议，确属难得。在以后的 20 多年里再也没能重现。

既是难得，就没有理由不去追问一下，这难得的机会是如何得来的？后来又为什么不能再现？翻翻历史就可以看到，这次座谈会是 1956 年提出“百家争鸣”的方针之后，仅有的两次全国性学术会议之一（另一次是自然科学界的遗传学座谈会）。两个会议的主旨都是要贯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高层力图向思想界学术界表明执行这一方针的决心和诚意。学术界则将其作为“百家争鸣”的方针的一次尝试。高层对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重视，只要从《人民日报》在 1956 年的 10 月到 1957 年的 5 月初之间，连续发表与会议论题相关的大块文章以及对于会议的非常密集的报道就可以说明。1957 年 3 月冯友兰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作长篇发言将这次座谈会作为贯彻百家争鸣方针的例证，被《人民日报》用《坚决拥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 冯友兰批判对这一政策的各种怀疑论调》这样醒目的大标题全文刊发，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这场百家争鸣的试验，是高层用于向全国的知识界、思想界、学术界表明“春天来了”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此次会议在国际上也有影响，会后，汪子嵩先生应邀给在华的苏联专家介绍会议的情况，专家们都饶有兴趣。顾红亮先生在哈佛大学档案中发现的当时美国哲学家霍金与陆定一、潘梓年、金岳霖的通信，也可视为一个佐证。

但是，1957 年夏季风云突变之后，这次会议就遭到了清算。1958 年初时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哲学组组长的关锋挑头对这次会议进行大肆抨击，给座谈会扣上了“哲学史研究中的修正主义”的大帽子，嗣后在各大学的“拔白旗”运动中，将这次会议以及会上活跃的一些学者作为重点的批判对象，大张挞伐，如冯友兰的言论被斥为“资产阶级伪科学”，并在报刊上广为传布。这一大转折，不仅标志着整个学术生态的改变，而且也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的短暂的“春天”已经告终。这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在当代中国思想史、学术史上所具